

家史与党史

我1986年高考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固态电子学本科专业,到现在已在集成电路方向努力钻研了35年。回忆过往,无论教书育人,还是科研工作,都遇到过艰难和挫折,但自己能如此执着和坚持,应该与儿时成长环境的熏陶密不可分。

我的父亲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市,1961年高中毕业即被保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读原子工程系爆炸物理专业,有幸成为哈军工第九期学员,1966年毕业后进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时称二机部九院),从事核武器基础理论及实验研究工作。

左图:“七一勋章”获得者李宏塔(6月29日摄)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右图:时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宏塔(前右)在安徽阜阳市颍东区插花镇慰问困难群众(2011年1月14日摄)

新华社发

父亲研究原子弹,女儿培养『芯』人才

我和同龄小伙伴在群山环绕、偏僻闭塞的山坳长大,作为一名九院子弟,耳濡目染了九院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受益良多。那时,多数的晚上和周末,父母和许多叔叔阿姨都是到办公室工作的。我和小伙伴们则在办公楼前后、走廊、楼梯肆意玩耍。

我们有几次被安静大楼里突然爆发的热烈欢呼声打断,感到少有的震撼。小时候不懂,长大了才知道,那是大人们共同努力奋斗的“国之重器”工作取得了成功。那欢呼声中,透着自主研发胜利的喜悦,也透着攀登科技高峰的自信!

印象中,父亲经常出差做实验,时间或短或长。他为了核试验工作,曾三次去新疆核试验基地。第一次是1973年7月,父亲说,那时的戈壁滩荒漠一望无垠,没有人烟,一天夜晚突降大暴雨,为避免实验室被雨水倒灌,工作队科研人员在暴雨中驱车前去封堵地下工号,可返程时却迷了路,汽车在荒漠中迷失徘徊了好几个小时,至今回想起来仍有些心悸。

父亲第三次去基地是1976年初,虽是寒冬腊月,面对着风沙严寒和冰冷的水泥墙,但每一位科研人员却是热情高涨,为了尽快取得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实验数据,父亲穿戴好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冒着受辐射的危险,冲进设置在爆区的测试工号,拿到宝贵的实验数据。

九院许多科研人员都兢兢业业,埋头钻研,从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立志将青春乃至生命贡献给国家的核武器事业。至今,他们重聚时,仍为自己曾经的无畏付出而骄傲,为自己能成为“国之重器”事业的一分子而自豪!

1986年,我在四川提前批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一志愿:固态电子学。这是从事“两弹一星”研发工作的父亲建议的专业。

1993年,我国芯片产业正处于革故鼎新的阶段,一批国有电子元器件厂关闭,新的项目还在酝酿,几番思考之下,我选择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九院的成长经历始终让我认为,既然要做半导体,就应该与千千万万工程师并肩努力,所以对成为一名集成电路产业一线工程师情有独钟。

2002年,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成立,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在内的沪上多所高校加盟,形成了芯片技术产学研的雏形。得知研发中心将派团队到国外从事130/90纳米工艺技术研发,我抓住机会多方申请,最终得以与工程师们一同前往,这段与产业工程师在全球顶尖研发平台上共同奋斗的研发经历,让我获益颇多,明确了自己在集成电路核心器件及模型方向的科研攻关目标。

近二十年过去了,我所在课题组的技术研发能力不断进步,不断探索更先进工艺代的关键技术……

近年来,外国的一次次芯片禁令引起了广泛关注。要知道,过去几十年,中国芯片产业一直在迎难而上,人家一次次用这样的方式警醒我们,要想做得更好就必须再埋头苦干,攻克、掌握更多的关键核心技术!“掌握核心科技,永攀世界高峰”,这是九院的座右铭,也一直深深铭刻在我心里。

要想突破集成电路产业链上更多的关键技术,就必须培养更多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这是高校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使命,但也是不易的。微电子是芯片产业强相关专业,非常硬核,不仅要掌握许多物理、数学、化学的枯燥理论,还要运用专业工具和计算机编程,进行大量技术实践,艰苦、枯燥的学习过程时常会让同学们迷茫。不同于许多人才成长“见效快”的行业,芯片人才要出类拔萃、引领产业,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的积淀。

我国正多方努力弥补集成电路人才的巨大缺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20年12月发布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通知,华东师范大学作为一所集成电路专业已走过50年历程的代表性高校,也正在筹划集成电路一级学科建设,探索人才培养的新举措。

有人说,芯片是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的“国之重器”,父亲和我有幸投身祖国的“两弹一星”和芯片事业,两代人的人生都是无比幸福的。

口述:石艳玲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本报记者董雪整理

革命后代李宏塔

“高光”下的“守常”人生

“七一勋章”获得者

新华社合肥7月12日电(记者陈诺、白斌)6月29日,“高光”再次打在李宏塔身上:这位72岁的老人站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接过“七一勋章”。

祖父是李大钊,父亲李葆华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出生在这样一个“高光”家庭,李宏塔始终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以严治家,秉持了“革命传统代代传”的宝贵本色,成为党员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

“守常”是李大钊的字,亦是李宏塔一辈子的执着追求。

“守常”就是守护艰苦朴素的优良家风

【活在老百姓中间】

20多年前,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路上,常有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蹬着自行车穿过熙来攘往的街头,沿路交警和摊贩都认得他——骑车上班的“李厅长”。

他便是时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的李宏塔。当过军人、做过工人,而后又在共青团、民政、政协等部门工作,一步步走上领导干部岗位。一个习惯伴随李宏塔的职业生涯:除了极少数因为重要公务赶时间,李宏塔坚持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随着年龄增大,2003年他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还笑称这是“与时俱进”。

李宏塔一生节俭,对吃、穿、住都不讲究,一家子曾“蜗居”在一套冬冷夏热的两居室里,一住就是16年。即便如此,家里却没有多少存款。每年单位组织“送温暖”“献爱心”,李宏塔捐赠的数额都排在最前面。他把老百姓当成自家亲戚,低保户过年的饺子皮没着落,前来求助的下岗工人没带伞,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都看在眼里,无论如何都去帮一把。

【一根红线连着三代人】

在祖父牺牲22年后,李宏塔出生了,他是听着祖父的故事长大的。“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是李大钊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收入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青年学生。

父亲李葆华多次教育儿子“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其家中的简朴也让人难以置信: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房,他说:“我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

“最好的家风就是父辈的言传身教。”李宏塔告诉记者,他和父亲长期两地生活,偶尔借着开会进京探望,父亲总是埋怨其耽误时间,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工作上。“父亲身体力行,严格要求自己,久而久之,我也知道了该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守常”就是守护服务群众的为民情怀

【“共产党人就是要和人民在一起”】

38岁,李宏塔走进安徽省民政厅。“给老百姓多办实事、好事最合我意。”李宏塔说。

在民政厅工作期间,李宏塔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用在下基层。很多同志都知道他的“反向工作法”:下乡时不向有关市县打招呼,经常让司机“把车子开到进不去的地方”,然后步行进村入户。

从群众家里出来,他再依次到各个部门座谈,“必须离开公路,直接去问老百姓。沿着公路、隔着玻璃看,不如自己的脚步踏实。”李宏塔说。

2003年夏天,淮河、滁河流域发生水灾。为了摸清灾情,李宏塔连续20多天奔走在灾区,“反向工作法”起了关键作用:他从安置点灾民盛救济米的米袋里掏出米粒,揣进公文包回去找相关部门化验,检查救济米质量;他走进受灾群众居住的帐篷,发现酷热难忍,赶紧测量气温,并带着温度计来到县委书记办公室,几天后,当地党政机关腾出办公场所,安置了3万多名住在帐篷里的受灾群众。

曾与李宏塔共事过的同志回忆:他从基层调研回来,常常穿着军绿色的球鞋、卷着裤脚,鞋上满是泥土,到了办公室,立即叫相关处室同志就调研中遇到的问题协商解决办法。

“民政部门做的事就两句话:为党和政府分忧,为困难群众解愁。”李宏塔说。

【“服务困难群众,是一件幸事”】

担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后,李宏塔的工作依旧与困难群众有关——分管机关扶贫工作。他带队的调研,是公认的行程满、节奏快,还喜欢四处“寻丑”“揭短”,专挑条件差的地方去。

农村的寄宿学校,城里的养老院、老旧小区,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在长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李宏塔围绕“推进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完善精准扶贫的制度化保障”“应对人口老龄化”“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等主题向全国政协提交过多份提案。

即便年逾古稀,李宏塔还担任过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依旧为慈善事业尽心竭力。在中华慈善总会“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的推广中,他深入全国多地基层调研。在一些地方,他“习惯性”地自掏腰包,慰问困难群众。“慈善就是直接为最困难的群众服务,这是晚年的一件幸事。”他说。

“守常”就是守护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我们只有一个权力,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一位同志向记者透露,给李宏塔送礼物是件堪堪的事。一年春节,这位同志和爱人给李宏塔送去几样小吃,李宏塔却回送了价值数倍的物品让他带回家。

他的父亲当年亦是如此。家中收到几

包葡萄干,李葆华让家人把葡萄干退回,少年李宏塔吃掉的那一包折价一同退款。父亲告诉李宏塔:“我们只有一个权力,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应该干的事。”

2008年,李宏塔的儿子结婚,婚礼布置简单,单位同事前来祝贺并包了红包。为了不破坏婚礼气氛,李宏塔照单全收,但第二天便将所有的礼钱如数奉还。“没那个必要也没那个习惯,这都是家里的传统。”

看似不近人情,面对群众却最重“人情”:每当到农村看到有的村民房子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太薄时,李宏塔比谁都着急,想尽办法帮助解决。身为一位“老民政”,他将日常工作归纳为三句话:“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孤残儿童为子女,视民政对象为亲人,这是新时代的‘铁肩担道义’。”

【继续向前永不停步】

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李宏塔感慨:“爷爷百年前的梦想,今天已经实现!”

在李宏塔看来,这样的“高光”时刻属于革命先辈。“回望我们党10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多少前辈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心血,甚至牺牲了生命。跟他们比起来,我仅仅是做了党员干部该做的事情。”他说。

“我会把勋章送到李大钊纪念馆,告慰李大钊同志。”李宏塔说,未来将是一段继续向前永不停步的旅程。“尽管我已退休,但今后依然要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不断传承弘扬下去,尽自己所能,做好我应该做的工作。”

为了群众的笑脸:田艳的印江“印象”

新时代优秀县委书记风采

新华社贵阳7月12日电(记者潘德鑫、吴思)田艳,2015年4月至2021年3月任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现任铜仁市万山区区委书记。

心系群众、关爱干部、务实清正、敢于担当……这是田艳在印江干部群众心中的印象。她认为,只要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和群众坐一条板凳,才能了解他们的所思所盼”

院坝中央,田艳坐在一条1米多长、巴掌宽的板凳上,身边紧挨着几十位村民,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大家庭聚会似的。

这是印江县朗溪镇三村村驻村第一书记任林手机里保留的一张照片。2017年10月底,田艳到村里宣讲十九大精神。“当时镇里给田书记准备了主席台,但她执意要坐到群众中间去。”任林回忆。

“不能用开会的方式和群众交流,群众不喜欢‘高高在上’的干部。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才能了解他们的所思所盼。”田艳说。在印江近6年,她跑遍了全县203个贫困村。

杉树镇83岁的土家族婆婆胡金华忘不了田书记亲自上门帮助解决住房问题;沙子坡镇残疾人王昭权在田艳的激励下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木黄镇“90后”特岗教师田迎常在微信上和田书记探讨乡村教育……

没有紧急公务时,田艳晚饭后会习惯性地去县城广场、河滩、公园等人多的地方“散步”。“说是散步,其实是检查工作。”曾任印江



田艳(右二)在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峨岭街道川岩村看望因公牺牲干警张曙光的家属(2018年6月30日摄)。

新华社发

县委办主任的谢守文说,哪里路不好、哪里路灯坏了、哪里卫生太差,只要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她看到后都会立即督促相关部门整改。

“群众利益无小事,多办些实事,就会多一些笑脸。”田艳说。

“大家拧成一股绳,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印江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曾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贫困发生率超过25%。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艰巨任务,严峻地摆在田艳和印江干部面前。

“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田艳说。经过全县干部群众齐心奋战,印江县于2019年4月退出贫困县序列,后又通过了5次国家级脱贫攻坚抽检和评估。“田书记对干部要求很严,在作风建设上不讲情面,但她考虑问题周到,讲究工作方法,像大姐一样贴心暖心,大家服她。”谢守文说。

“为官避事平生耻。”田艳认为,县委书

记是全县党员干部的主心骨,必须责任在心、担当在肩,豁得出来、顶得上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田艳果断在第一时间将脱贫攻坚体系转换为疫情防控体系。因为措施及时得力,印江县疫情防控实现零确诊、零疑似、零输入。

“她总是冲在最前面,责任替我们担了,压力替我们扛了,我们的工作再干不好真觉得对不起她。”冉飞鸿说。

“要为发展‘找门路’,不为自己‘开后门’”

“要动用所有资源为印江发展‘找门路’,但决不能动用半点关系为自己‘开后门’。”田艳多次告诫全县干部。

田艳有个亲戚建了新房,想申请危房改造补助,经办工作人员拿不准,向田艳报告。“不能批,他家情况我了解,经济条件不差,不符合政策标准。”田艳回应。

印江县召开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大会时,田艳要求领导干部的配偶等亲属参加。一位参会干部表示,爱人之前老是抱怨他陪家人的时间太少,抱怨他当官没帮亲戚朋友办点事,通过参加警示教育大会,爱人受到很大教育,让他安心工作、勤政廉洁。

2016年9月,印江县峨岭街道川岩村村支书张曙光因公牺牲。田艳多次登门看望、慰问张曙光的家人,每一次,她都详细询问他们家里的近况,了解是否有困难需要帮助解决……“田书记算是做到‘边’了,不能再好了。”张曙光的父亲张羽松感动地说。

“田书记对干部要求很严,在作风建设上不讲情面,但她考虑问题周到,讲究工作方法,像大姐一样贴心暖心,大家服她。”谢守文说。

有人说,芯片是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的“国之重器”,父亲和我有幸投身祖国的“两弹一星”和芯片事业,两代人的人生都是无比幸福的。

口述:石艳玲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本报记者董雪整理